

魂系白陽梁

郑艳芬 师如江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 五十四路 电话：3801111）
（邮编：050031）



魂系 向陽隊

王果榮題

郑艳芬 师如江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系“向阳队”/郑艳芬,师如江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6

ISBN 7-5378-2220-4

I. 魂… II. ①郑…②师…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261 号

魂系“向阳队”

郑艳芬 师如江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4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378-2220-4

I·2131 定价:12.80 元



作者简介

郑艳芬，天津市人。在天津耀华学校读小学、中学。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山西省翼城县南梁中学、翼城中学、山西临汾一中，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共30年，现已退休。勤于笔耕，擅长散文、游记，以纪实散文为主，常发表于报纸杂志，文字朴素自然。2000年初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百喻经》故事简说》一书。师如江，山西省翼城县人，1966年高中毕业。曾回乡务农，作代理教师，工厂做工。1971年由工人提拔为国家干部，1983年考取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干部政治专修班学习两年。从事纪检工作20余年。曾任山西省临汾市纪检委副书记等职。现任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副主任。



不日
 朝信
 聊存
 转赋
 弘揚
 以含
 操我
 元在
 京梓

西江月
 王景荣
 已卯仲秋

王景荣先生《西江月》词手迹影印件

蔡梓贤风淑范，杏坛雅望清操 几经磨炼品益高，桃李枝头含笑
 泣血弘扬教化，倾心转赋风骚 待酬宿愿喜今朝，仁者青春不老

西江月 书奉艳芬如江偈正 已卯仲秋 王景荣



南梁“三凤”合影(2000年4月) (左起:郑艳芬、付承凤、蒋太凤)



北师大五学子合影(1980年9月)

(左起:杨登印、郑艳芬、王颂昌、程英华、刘清平)



1970年“向阳队”部分队员在小河口水库合影

(后排左起:何希亭、焦建军、李朝军、李德山、段海英 中排左起:霍淑鸾、李根生、贵立义、高旭光、蒲国定、秀绍平、张淑苹
前排左起:刁明仁、许建华、程志旺、李嘉贵、赵连堂、王景荣)

喜看桑榆霞满天

——《魂系“向阳队”》序

郑艳芬同志的文集《魂系“向阳队”》付梓行世，可喜可贺。艳芬同志命我为之作序，真令我有些惶恐不安。因我一非文坛耆宿，二非社会名流，充其量不过是个喜欢一点文学的人士，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过是个一般读者而已。以我这样的身份为文集写序言，不啻难以为大作增辉，而且可能招来附庸风雅之嫌。奈何老朋友重托，言词恳切，且如她本人所言，我是对她的生活道路及所记人和事都较为熟悉的人之一。盛情难却，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

我和郑艳芬同志初识于1968年底。当时，1966届、1967届、19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陆续分配工作，离开母校。按照当时有关文件的规定，我们这些在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指引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就这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商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林学院等八所大学的21名1968届本科毕业生，便汇聚到了山西省晋南地区（后来分为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翼城县小河口水库工地。其中有我，也有郑艳芬同志。

喜看桑榆霞满天



魂系“向阳队”

我们这21个人组成一个临时的集体，由当时翼城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吉永乐同志直接领导。既然是个集体，总得有个名称。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唱道：“社员都是向阳花。”于是我们便决定以“向阳队”为名，取扎根农村、学习贫下中农、红心永远向党之意。我们选举了队长，组建了队委会，确定了分管劳动、学习、生活和文体活动的负责人，还办起了一块黑板报。从此，我们对外自称是“向阳队员”，在内部则戏谑地互称“同库”。就是这样，便开始演绎出这本文集中所讲述的“向阳队”的故事。

21名“向阳队员”，15男6女，分别居住在王庄公社新村大队几户农民的土窑洞里。这种窑洞阴暗潮湿，不要说没有自来水，连电灯也没有。白天我们在水库工地上放炮、开山、拉车、运土，手脚不停地干一整天，累得腰酸背痛，有时晚上还得加班，挑灯夜战。没有加班任务的夜晚，只能各自坐在煤油灯下翻看书报，或给远方的亲友写信。这里是没有公共食堂的，我们只好自己出钱雇了一位当地农民，每天给我们做极简单的农家饭菜，使我们大体上能填饱肚子。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离开学校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几位同志，对此一时的确难以适应。但是，人家硬是凭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一片赤诚和顽强的毅力，都坚持了下来。吉永乐同志对我们还是很关心的，经常到工地上来看望，了解我们的思想、劳动和生活情况，有时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群人因一种在当时看来似乎很平常的理由而聚集在一起，我以为这也是一种缘分。尽管劳作艰辛，生活单调、清苦，尤其是在每个人的心头，都笼罩着一层由“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一下

子变成仅次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的无以名状的悲凉和失落感，但我们毕竟尚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且每个人都对未来依稀充满着希望，因而绝大多数“同库”都显得积极、乐观，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整个集体也是团结、和睦的。

除了参加水库建设之外，农事大忙时期我们还帮助社员们抢收、抢种，节假日休息时与社员们共同联欢，在漫漫冬夜里有时与老贫农围坐在煤油灯下或火炉旁谈天说地、评古论今、闲聊家常、共话桑麻……在这些朴实的农民眼中，我们这伙人非但不“臭”，而且都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京城里的大学生应该去干大事，为什么要到这穷山沟里来修水库呢？”对此，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有些人在深感困惑之余，还免不了要替我们发几句不平之鸣。在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中，“向阳队员”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不仅得到了他们从各方面所给予的力所能及的关怀和帮助，而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和在学校里、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生产、生活知识。

“向阳队”共存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1971年底至1972年初，随着我们被陆续地正式分配工作岗位，这个临时集体也就自行解散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对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工作乃至一生的事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老实说，虽然我们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全部都是劳动人民或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弟，而且大多数出身寒微，自幼在贫苦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成长，但是在首都北京读了四五年大学，饱读诗书、经典的同时，也难免在不同程度上滋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在各个学



科、各个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统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把大中专学校毕业生也一律列为“臭老九”，遣送边远的农村、山区去劳动改造，这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一部分。对此，必须予以坚决揭露，彻底否定。但是，在客观上，我们这些人在被捧得高高之后一下子被摔到了社会底层，确也使我们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对现实生活、民间疾苦、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等等，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从而心胸为之开阔，意志受到磨炼，才能得以增长，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我们所直接接触的、与我们共同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人们，都是最平凡、极普通的劳动群众，旧时代所谓“芸芸众生”者，也就是指这些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很少有人问津，他们的意见、要求一般没有机会表达，但他们勤劳、刚毅、淳朴、忠厚、正直、善良，正是他们构成了炎黄子孙的绝对多数，正是他们奠定了共和国大厦的不朽根基。我从他们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文化的无穷魅力，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所蕴含着的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巨大能量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就在我们的执政党高层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处心积虑地妄图“改朝换代”，从而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历史关头，他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自己一点一滴、默默无闻的劳动积累，为全社会提供着粮食、蔬菜、油料、棉花……满足着人们最起码的衣食之需，从而为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试想一下，在那天下大乱的年代，整个国民经济几乎跌入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全国八亿农民所做出的贡献，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或许，不仅林彪、江青及其“四人帮”之流真的要去吃“社会主义的草”了，就连党内的健康力量、全

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同这群丑类的倒行逆施所进行的斗争，也会因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因而从那时起，我才感到自己真正学懂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共产党人必须永远相信和依靠群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论述，并在心底里暗下决心，将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尽自己之所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愿望为依归。

我们所走过的这段人生历程，大体上可以说是同时代人的共同经历。我们之所以能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不灰心、不气馁、不颓废、不自暴自弃，而是正视现实，顽强地克服困难，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积累知识和经验，充实和完善自己，这是党对我们多年来培养教育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关怀和帮助的结果。由此也充分证明，林彪、江青之流所施展的种种罪恶图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教训，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我国人民在吃了这一茬之后也变得更加聪明，因而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再也不会重演，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力量而横遭迫害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但是，痛定思痛，冷静地反思一下，我觉得知识分子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这个大方向今后还应该继续坚持。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在走出校门之后，如果能自觉地到基层工作岗位上，到社会生产第一线，去经受考验和锻炼，去实际运用和检验所学的理论知识，摸索和积累实践经验，开阔视野，增广见闻，在社会实践中确立自己科学、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坐标上的定位，这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发展，必将受益无穷。许多人都知道，古代思想家孟子有一段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中抛开第一句所反映的唯心主义宿命论观点外，整个还是有道理的，即一个有才有志之人，只有经过各种各样艰难困苦的考验和锻炼，才能在实践中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干出一番事业。我们“向阳队”的21位同志，绝大多数后来在各条工作战线、各个岗位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以为这与当年在艰苦条件下所经受的锻炼分不开。我们同龄人中那些成长为各项事业骨干和栋梁之才的，也正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顽强地战胜困难，同时战胜自我的结果，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郑艳芬同志。可以说，她在“向阳队”中是颇具个性的一位。她身材瘦小，举止端庄，性格开朗，为人正派、热情，富有文采，曾担任“向阳队”黑板报的主笔。除了这些特点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的婚姻。她在“向阳队”的“同库”中是属于结婚较早的。男方师如江同志是翼城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农村户口，时任县机械厂的合同工。按现在的说法，他当时不过是个来县城打工的农民。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段姻缘确乎门不当、户不对。北京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嫁给了当地农民，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当然，人们的说法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有的予以肯定和赞许，甚至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典范；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心血来潮，担心她（他）们的婚姻关系难以巩固和持久；还有的人暗自揣测，以为郑艳芬是在赶“政治时髦”，想捞取什么“资本”。如此这般，不一而足。面对所有这一切，郑艳芬同志泰然处之，我行我素，坚持走自己的路，臧否褒贬任由人。

坦率地讲，当时我对郑艳芬与师如江同志结合的缘由与基础，也不甚了然。我只是觉得，婚姻乃个人的私事，他人无权干涉，亦不须置评；而且我相信，郑艳芬之所以爱上师如江，

毕竟因为如江同志有值得她倾心爱恋之处。后来我才知道，她（他）们的结合确与当时的政治风云有关，但绝不是郑艳芬同志想赶什么“政治时髦”，而是因为在同极“左”路线带给她的政治迫害的抗争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相知相爱的佳偶。二人结成连理，是有坚实的政治基础、道德基础和感情基础的。婚后三十多年来，艳芬、如江伉俪相濡以沫，情深意笃，共同克服了许多为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困难，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在家庭生活和事业上也都卓然有成。我打心眼儿里钦佩她（他）们，认为此二人堪称为模范夫妻。当初，人们从两者的家庭出身、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来看，觉得互相不太般配，连她（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段姻缘确实是个“人生的不等式”。然而，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如江同志已由一名普通农村中学生变成成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优秀毕业生，由一个县机械厂的合同工成长为地区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干部，她（他）们以自己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生真谛的实践，圆满地解开了这个“不等式”，让一切讥讽、猜疑、担心统统化作一片云烟，消逝殆尽。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如江同志基本素质好，刻苦勤奋，顽强拼搏，因为内因毕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但外因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在某种情况下，外因也能成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在如江同志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结着艳芬同志的心血与汗水，饱含着一位贤淑女子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丈夫、家庭、美好人生的一往深情和永恒的爱。

三十多年来，艳芬同志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从南梁中学、翼城中学到临汾市第一中学，执教讲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了。她在呕心沥血地向年轻一代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在家庭生活中成功地扮演了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孝敬三对公婆，相夫教子，不仅深受



如江同志所出身的这个农民大家族全体成员的一致爱戴，而且赢得了街坊邻里的交口赞誉，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嘉奖。事实表明，艳芬同志不愧为事业上的能人，生活中的强者。我觉得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与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有机统一与和谐。

现在，艳芬同志已年满 55 周岁，她决定告别讲坛，让位于年轻学子、后继风云。从今后，自己专心从事写作，以期在后半生驰骋文坛，得酬青年时代的宿愿，再铸人生道路上的辉煌。收入这本文集的作品，其中不乏感人肺腑的佳篇、力作，让人读后足以从中领略到作者对社会生活独到的观察、思考和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力，但这些都不过是她小试锋芒的成果。相信她在未来的岁月中，辛勤笔耕，必有更加丰硕的收获。孔老夫子有云：“知者乐，仁者寿”。像艳芬同志这样既富聪明才智，又有仁德爱心的人，一定能够精神愉快，生活幸福，青春不老，健康长寿。

信手写就上述这些，权充序言。最后，我以不久前赠艳芬同志的一首七律为本文作结。

三十春秋弹指间，
青丝染雪凋朱颜。
人生百味谁能解，
世态千姿我尽观。
矢志终身无愧悔，
回眸往事有甘甜。
休言晚照黄昏近，
喜看桑榆霞满天。

王景荣

2000 年 12 月 30 日于成都

岁月沉淀着情感

读郑艳芬女士《魂系“向阳队”》、《南梁“三风”》、《北师大学子在翼城》、《清明无客不思家》等饱含“翼城情结”的系列散文，不时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不是为她质朴无华的文字，也不是为她不甚讲求的为文结构，是为他们那一代艰涩凄楚的命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奋争，为她每一篇文章中山西情结的沉重载体，为那一团儿浓郁的渐渐被岁月沉淀着的情感。

一群首都高校的毕业生，在那样一个举国狂热而又风雨飘摇的非常年代里，被命运的大车颠簸着，逆来顺受的被抛却在黄土高原上的那一个偏远而封闭的小小所在，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以一个时代青年的热忱、无私正视困难，面对生活；他们迷惘过、沉思过，这种迷惘是无奈的，这种沉思是痛苦的，为自己的人生遭际，更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给予他们的出路只能是奋争和苦斗，他们把一腔朴素而动人的鲜血化作黄土高原上最艳丽的红牡丹，把美好的青春岁月染成天边最壮丽的朝霞……如今，风雨早已停歇，尘埃早已落定，回首那一段可歌可泣又难以评判的岁月，渐渐地走入人生壮年的郑艳芬的内心是平静的，也是激奋。真的，那是一个罄竹难书的时代，点缀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上的千千万万个他们



奋斗与抗争的意义却是多重而多元的。三十载岁月磨砺之后相对稳定的今天，回望那一段可谓峥嵘岁月，郑艳芬在叹喟之余也有她独到的思索，她在挖掘和提炼着一种精神，她在过滤着一种情愫，在她不紧不慢分外节制的叙述之中，潜藏其中的理性光芒闪亮而出。

质朴无华的语言叙说中 细腻了的是昔日的情感

不知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还是自己特有的诉说方式，在我看到的郑艳芬不太多的散文篇章里，总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语言朴素得几近于不甚讲究。文如其人，语言大约也如此。在同她不多的几次谋面中，给人的感觉是真诚、质朴、自信和平和。她的散文中没有或者说根本不去追求语言的修饰，她娓娓叙说，自然为文。女性惯有的小细腻、小聪明、小观察和小敏感在她的文章中是寻觅不到的，她在本分而质朴地叙述着抑或追忆着，不慌不忙，不急不躁，驾驭着自己平实的语言的犁铧，深耕在对昔日岁月深情缅怀的沃野里。

这让人自然联想到十年前文坛所流行的新写实文学潮流。想到这个文学潮流中的特色之一，便是不去过多地关照笔下的语言。原生态的沉重生活载体使作者无意或无暇顾及需要分外注重的语言运用，对生活的原始流的急切表现使新写实作家们的话语现象出现了芜杂和粗糙。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们文学性的光亮，通过粗鄙化的语言我们依然享受到了阅读和审美的快感。究其原因还是所展示的生活原生态的大团色块以及这浓郁色块里面所渗透的情感直观。

郑艳芬女士的散文却没有新写实的语言的庞杂和意绪的滋